

◆ 邱培成 著



描绘近代上海都市的一种方法

——《小说月报》(1910-1920)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研究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黄霖先生七秩华诞纪念文丛

描绘近代上海都市的一种方法

——《小说月报》(1910-1920)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研究

◆ 邱培成 著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描绘近代上海都市的一种方法 : 《小说月报》 (1910~1920) 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研究 / 邱培成著.

— 南京 : 凤凰出版社, 2011. 6

ISBN 978-7-5506-0630-2

I. ①描… II. ①邱… III. ①小说研究—中国—现代
②城市文化—研究—上海市—近代 IV. ①

I207. 4②K29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22730号

- 书 名 描绘近代上海都市的一种方法
——《小说月报》(1910-1920)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研究
- 著 者 邱培成
- 责任编辑 李相东
-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 印 刷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句容市春城镇南 邮编:212404
- 开 本 880×1230毫米 1/32
- 印 张 9.625
- 字 数 259千字
- 版 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06-0630-2
- 定 价 34.00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1-87871135)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节 报刊的兴起与小说抒写的新变	(2)
第二节 城市文化及其发展的历史进程	(6)
第三节 杂志与都市文化研究的现状、方法和意义	(10)
上编 《小说月报》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	(17)
第一章 《小说月报》(1910—1920)的编辑理念	(19)
第一节 从《小说月报》看清末民初小说观念的演变	(19)
第二节 从《小说月报》看清末民初对小说长短篇的认识	(30)
第三节 栏目调配增删的编辑方针	(40)
第四节 关于翻译和创作小说	(42)
第五节 《小说月报》与插画栏	(45)
第二章 《小说月报》的两任编辑和作家群	(51)
第一节 编辑、小说家和诗人:王蕴章	(51)
第二节 编辑、小说家和名医:恽铁樵	(57)
第三节 以《小说月报》为中心的作家群及其作品	(64)
第三章 《小说月报》的思想倾向及其文化影响	(84)
第一节 张元济的出版思想及其对商务和上海文化的影响	(85)
第二节 商务出版思想影响下的《小说月报》	(93)

第四章 《小说月报》的印刷出版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	(98)
第一节 《小说月报》出版发行的现代化	(98)
第二节 印刷出版的发展带来文化的革命	(105)
第三节 印刷出版的发展引导思想观念的变革	(110)
第四节 上海文化繁荣促进了印刷出版业的发展 ...	(114)
第五章 杂志、读者与都市文化间的互动	(122)
第一节 作家、小说杂志与书局	(122)
第二节 读者、杂志与上海都市文化	(134)
下编 小说作品与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	(143)
第六章 清末民初都市小说与上海大众文化	(145)
第一节 清末民初上海都市的大众文化	(145)
第二节 解读清末民初的都市小说	(159)
第三节 小说与都市文化的关系	(171)
第七章 小说现代化与清代民初上海都市文化的现代化	(182)
第一节 以《小说月报》作品为代表的小说现代化 ...	(182)
第二节 上海都市现代化的文化映照	(188)
第八章 小说作品所表现出的上海都市文化	(211)
第一节 《小说月报》作品展现出的时代景象	(211)
第二节 小说中透出的文化意识	(219)
第三节 小说对清末民初上海都市的反映	(238)
第四节 都市文化焦点主题的艺术再现	(254)
第九章 小说作品中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	(267)
第一节 知识群体形象的代表	(267)
第二节 农民、工人、商人和买办	(279)
第三节 对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思考	(290)
主要参考文献	(294)
后 记	(302)

绪 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随着西学东渐,新的实用技术伴着新的思想观念蜂拥而至。在国内,短短的二十来年,中国社会相继经历了百日维新、君主立宪、辛亥革命、民主共和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和军阀政府,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国内政治变革和欧风美雨的洗礼之中,上海这个 1843 年开埠后才崛起的都市,成为当时中国现代化程度最高,也是最繁华的东方大都市,甚至被誉为东方的巴黎。如此文明,不仅反映在硬件上,更表现在文化事业这样的软实力上,对此,正如包天笑所说:“上海这个地方,是江南繁盛之区,又是为外国租借地,凡事得风气之先。”^①报刊业和印刷出版业的繁荣约略可以看出些端倪,并成为描绘近代上海都市的一种方法。比如:

《申报》,中国第一份长寿的中文报纸,1872 年创刊于上海,和后来的《新闻报》、《时报》一起,成为当时上海最有影响的三家大报。从其经营方式来看,经历了由外资、合资到中资的演变,这一改变本身已经显示了国人对文化事业渐趋重视。当然,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此种趋势不无利益的驱动,不过,作为文化象征的报纸,营利本身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上海乃至于国人对文化的日益喜爱。《申报》对上海人影响深远,竟至于老上海人把过期的旧报纸习惯性地统称“申报纸”。早期《申报》的增刊三“琐记”(《瀛寰琐记》、《四溟琐

^①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续编》第 112 页,大华出版社 1973 年版。

记》、《寰宇琐记》),是近代上海最早一批文学刊物。《海上奇书》,韩邦庆创办于1892年的上海,成为后来小说杂志的先导。继之而起的清末四大小说杂志(《新小说》、《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除了《新小说》(1902年创刊于东京,第二年迁回到上海)外,都创刊于上海,并积极倡导新小说。创办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是当时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国内最有影响的印刷出版企业。上海的印刷出版企业繁多,单是福州路上的大书店就有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五家,成为上海文化街的主题。因此,可以说当时的上海就是一座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都市。

第一节 报刊的兴起与小说抒写的新变

清末民初,所谓的大众传媒主要指报纸、杂志之类的印刷产品。19世纪的中后期,报纸、杂志开始兴起,新的文化传播方式就此诞生。此后不久,传媒的作用开始显现出来。就所影响的人数来看,“上海各士绅无不按日买阅”,1890年《申报》每天的销售量已达2万份,有人曾作过计算,如果每份报平均有5人阅读,《申报》每天的读者就能有10万人之众,还不包括外埠的销数。1895年以前,上海人可以看到的中外文报刊不下十种,以此类推,以打折的形式扣除不如《申报》的影响的因素,这样上海每天至少有30万人阅读报刊^①。这个数目在一个有着150多万人口的海,已是为数不少。大众传媒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在此就其对小说的影响稍加审视。

一、小说传播方式的创新

中国古人史传观念强,所谓“史贵于文”,对于把“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作为书写内容的小说,向来不以为然,且因其“名不正”而加以鄙视。小说不能像经、史那样受到全社会的尊崇,也不能像八股文那样得到士子们的青睐。梁启超对古代小说“海淫海盗”的判词,

^① 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93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更是把小说作为惑乱士子们思想、性情的罪魁祸首。家长们也因孩子读小说荒废了举业大力封杀。小说在官方已经丧失了存在的合理性。为获得生存空间,获取走进象牙塔的通行证,小说努力取向于“补史”,突出教化功能,不惜扭曲自己,牺牲自己的美学特点,其结果不管鸿篇巨制,还是短篇之作,不乏陈旧的、赤裸裸的、毫无生气的说教。直到清末民初,小说才为大众所认同,被梁启超鼓吹为“文学之最上乘”。如此变化,与梁氏等人“新民”要求紧密相连,因为他们看到了小说在社会大众中的巨大影响,康有为的《〈日本书目志〉识语》中就说当时的书市,“‘书’、‘经’不如八股,八股不如小说”。如此影响,与小说在此时的传播方式不无关系。

清末民初,在上海这个工商业发达的都市,信息越来越为人们重视,作为信息的主要载体大众传媒发展起来,并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信息来源和重要的娱乐消遣。这一点可以从当时大众传媒之广告业的发展中窥之。报刊广告,在我国始于1872年的《申报》。当时,广告地位仅占第六版的四分之一,后来,《申报》、《新闻报》改版,“把广告与新闻夹杂排列,于是广告地位增多,刊例亦分门别类”。《新闻报》所刊登的广告几乎占全部篇幅的三分之二^①。广告越来越被商家重视,并进入“寻常百姓家”,给他们的生活带来方便。在实用的同时,人们也需要娱乐、消闲,于是,在报刊上阅读小说成为大众不错的选择,这一现象在当时众多小说作品中多有反映。小说杂志开始繁荣起来,各大报纸纷纷开辟文艺副刊(小说是其中主要的刊载对象),小说传播方式开启了新的时代。报纸、杂志连载小说,内容比较丰富,各种不同风格的小说交叉阅读,可以调节口味,没有了阅读单行本小说的单调,读来也不至于乏味。

通讯、交通行业的发展为报刊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像新闻就要求迅速、及时,否则,对读者来说就是旧闻了,电报为远距离的传递提供了便捷。包天笑回忆在《时报》工作时提到,报社一般在北

^① 平襟亚、陈子谦《上海广告史话》,《上海地方史资料》(三)第133页,上海社科院出版1984年版。

京都有专门获取新闻的人。常常是报纸的版面已安排就绪,为着等电报得拖到很晚。交通的发展,开拓了上海以外的市场,扩大了传媒的影响。包天笑在苏州时,订阅的《申报》,头一天下午的报纸,第二天就可以看到。当然这得益于小火轮的出现,改善了水上交通。也许正是诸种因素的影响,小说杂志继《海上奇书》之后,于上海勃兴并走向繁荣。在晚清 22 种以小说命名的专刊,有 15 种出版地点和上海有关^①。若以 1902—1917 年为考察对象,这 15 年中以小说命名的杂志(其中含报纸两种)有 29 种,有 22 种出版地点与上海有关^②。在报刊刊载的晚清小说中,上海创作的晚清小说“占总数的 52%”^③,若再加上翻译小说,此比例将更大。上海无疑是清末民初小说出版的重镇。报纸、杂志成为小说传播的重要方式,甚至许多单行本小说最初就是通过报刊连载,后来才结集出版的。为了方便读者,杂志编辑们也煞费苦心。比如《小说月报》在《本报七卷预告》中说:“短篇小说及各种文字,每篇另页刊印,可分可合,分类拆订,随心所欲。”这种“可分可合”的编排,已经为结集做好了准备。再看当时小说杂志的页码编排,多是每篇独立标页,并不是像后来那样使用方便的连续标页,这里可能也有着结集的考虑。

二、小说表现手法的突破

小说传播方式的变革,对传统小说的写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小说写作要更多地适应报刊连载的特点和多产、快产的要求,甚至不惜让新闻事件走进小说。

对于报刊连载小说的写作,梁启超有着深刻认识:“寻常小说一部中,最为精彩者,亦不过数十回,其余虽稍间以懈笔,读者亦无暇

① 王燕《晚清小说期刊史论》第 17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② 陈平原《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第 68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③ 陈大康《关于近代小说研究的一些思考》,《明清小说研究》2001 年第 1 期。

苛责。此编既按月续出,虽一回不能苛简,稍有弱点,即全书皆为减色。”^①报刊连载的小说,应每一回都要精彩,足以吸引读者,因此,要求作者必须以每一次内容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来结构故事,而不只是从通篇上去把握。也就是小说以章回为结构单元,自成一个小的体系,展现自足的趣味。在叙事上,有的保留章回体的痕迹,如说话的口吻,悬念的结尾,诗歌的收结等;有的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形式上暂时摆脱了章回体,但由于受众的大众化,他们所习惯欣赏和乐于接受的仍是章回形式,因此,实质上小说仍沿袭章回体的传统,只是稍加变化而已^②。早期的连载小说不以章回的整体为起讫,而是以版面的要求为准,常常一句话要等到下期才能读完,既不利于阅读,也不便于装订。梁启超的《新小说》终结了此种连载小说的随意性:“本报所登各书,其属长篇者,每号登一回、二三回不等。惟必每号全回完结,非如前者《清议报》登《佳人奇遇》之例,将就装订,读气未完,戛然中止也。”^③从这一点上来说,小说章回形式也适应了报刊连载的需要。作者由于写作时间的仓促,无法像前人那样精雕细刻,“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的严肃、认真早已不复存在了,呈现的是“不假思索,下笔成文,十日呈功,半月成册”的草率。因此,结集后,整个故事缺乏必要的前后钩连,结构松散,甚至还会有前后矛盾之处。

报刊上的新闻,满足了人们了解世界的要求和猎奇的心理,吸引着大众阅读。然而在写作上重叙事,有着生动、曲折的故事,形象性强的小说,更容易进入人们的阅读视野。因此,上海三大报后来纷纷办起了副刊。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为迎合读者对新闻的兴趣,作家写作中接纳了新闻的实录特点,加之当时作家的高产、快产,使他们在创作材料缺乏而又来不及沉淀生活时,直接把生活融

① 《新民丛报》第20号,1902年。

② 颜琳、於可训《报刊的出现与连载小说的兴起》,《山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

③ 《新民丛报》第14号,1902年。

进小说。小说中报章的意味浓厚了。不管怎样,小说的新闻化是小说针对传播方式新变所做出的应对,然而由于缺少“陌生化”的艺术魅力,束缚了读者欣赏中的艺术再造,另外,小说向新闻报道认同,失落了小说本身反映人生,表现人心的使命,缺少了典型性,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最终被迫放弃^①。

第二节 城市文化及其发展的历史进程

中国的城市最早产生于何时、何地,考古学、语义学从各自的领域,进行着殊途同归的探索。考古学认为,城市产生于公元前3000—2000年,相当于原始社会后期至夏朝末^②。语义学从文献资料出发,考察文献对“城市”一词的记载,来明确城市的出现。城市最早是两个词,许慎的《说文解字》释“城以盛民也”;“市者,买卖之所也”。例证还可以举出一些:

昔者夏桀作三仞之城。(《淮南子·原道训》)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论语·阳货》)

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孟子·梁惠王上》)

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易·系辞》)

城市的合称,早在先秦文献已经出现,最迟也晚不过战国。《韩非子·爱臣》已有:“大臣之禄虽大,不得藉威城市;党与虽众,不得臣士卒。”《战国策·赵策》中“城市”一词出现过两次:“今有城市之邑七十,愿拜内之于王,唯王才之。”(卷18)“乃割济东三令城市邑五十七以与齐”(卷21)。城市一词从其构词而言,是联合式的合成词,使

① 颜琳、於可训《报刊的出现与连载小说的兴起》,《山西师大学报》2001年第1期。

② 戴均良《中国城市发展史》第3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用中语义上有偏向,“辛亥革命以前称城,辛亥以后城为市,其实质亦无不同”^①。

中国古代的城市发展缓慢,而且在功能上也是集政治、军事、经济等于一体,单以工商业闻名的城市不多。究其原因,首先,中国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度,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工商业的发展,放慢了城市发展的脚步,这种状况在漫长的中国城市发展史上一直存在。其次,在人们的观念中,城市和乡村皆为“王土”,市民和农民同为“草民”,城市和乡村没有特别的区别。对农民来说,城市甚至象征着某种危险,因为那里有官和衙门,中国老百姓向来是怕官和吃官司的,可谓是“怕官及城”了。第三,若从职业上来考虑,城市居民多以工商为职业,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中,工商业者的地位还在农民之下,行业的卑贱似乎也阻碍了中国城市的发展。因此,直到清末民初,此种状况仍未有大的改观。近代西方则大不相同,工商业发达,工商业城市占有很大的比例,于是建构在商品经济基础上的公民、自治、主权、民主等政治文明出现了。而且,西方的工商业城市还规定,如果农奴逃进城里,居住了一定的时间,就自然脱去奴籍,成为自由市民。因此,人们向往城市,憧憬着它的自由和文明。统而言之,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带来了东西方城市发展的明显差异。城市经济的发达也带来了文化的活跃,两者是成正比的,所以以城市为载体的城市文化,东西方是有着巨大差异的。

城市文化究竟为何物呢?它是一种相对乡村文化的文化地理学概念上的文化形态,是城市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的总和。它是市民在长期的生活过程中,共同创造的、具有城市特点的文化模式。具体说来,包括物质的或有形的器用品,如城市建筑、公共娱乐设施,交通工具等;也包括社会心理、价值观念、伦理道德、文学艺术、习俗以及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等无形的方面^②。

① 唐振常《近代上海探索录》第58页,上海书店1994年版。

② 张汝钟《城市社会学》第169页,上海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在我国古代,由于各个时期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城市文化也就呈现出不同状态。除了史书之外,城市文化多保存在一些文学作品特别是小说中。汉魏六朝时,文人多以赋体的形式,展示城市的繁华及其文化的丰富多彩。赋体本身的铺排特点,夸饰的语言,掀起了海涛般的气势,描写了雄伟华丽的宫殿,高大厚重的城墙,宽阔的大道,热闹的街市,阔大而又富丽的皇家园林等,以此来显现城市的华美,展现国家的声威。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写出园林的气派,汉帝国的强大。真正开始以城市为题材的赋,最早是扬雄的《蜀都赋》,东汉的杜笃写了第一篇描绘京都的《论都赋》。后来如傅毅的《洛都赋》、《反都赋》,崔骃的《历都赋》,班固的《两都赋》(长安和洛阳),张衡的《西京赋》、《东京赋》、《南都赋》,左思的《蜀都赋》、《吴都赋》、《魏都赋》以及葛洪的《西京杂记》、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等,从中可以看到长安、洛阳等城市的景象和城市文化的繁荣。在此期间,以赋的形式描写城市及其文化的写作十分流行,作品繁多,并凝固定型为一种书写格式,难怪萧统的《昭明文选》把描写“京都”的赋列于所收十五类赋作的最前面,汇集的描写京都的赋达六卷之多。

唐代结束了六朝的长期分裂,恢复了大一统的局面,唐王朝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强盛和富庶。交通运输畅通,海陆贸易普及,同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日益繁多,且文化是以先进面目展现的,文学上出现了代表一代之盛的唐诗。因此,都城长安有“世界首都”之称。人们的眼界开阔,心态上有着鸟瞰一切的优越感,显示了“帝都气象”。杜甫的《丽人行》,写出了长安人三月三游曲江的习俗。还有唐传奇小说,如《霍小玉传》、《李娃传》等,都是以长安作为故事背景或故事发生地的。文学作品中不仅写出了器用层面的文化,如建筑,街市、北里以及人们的衣食住行等;也写出人们,特别是士子对于感情与家长制的矛盾心理,女人的无助和被歧视等非物质层面的文化特征。

如果说唐代文化充满着浪漫情怀,那么宋代文化则更多走向民间、走向世俗。宋代在国力上、气派上都无法与唐代相比拟。若是

把唐比作大家闺秀,那么宋就是小家碧玉。宋代城市经济发展起来,手工业相当发达,市民阶层壮大了。宋初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都城开封街市的繁盛景象。文学上,柳永的《望海潮》描述了杭州的繁华富丽。宋话本小说的成熟,也很能说明当时城市文化的状况。说话是城市娱乐场所“瓦肆”中的表演项目,是一种可以为之谋生的职业,它具体可分为四家。《武林旧事》和《都城纪胜》都对此有过具体描述。说话行业的兴盛,反映了市民阶层文化活动的活跃。话本小说的兴盛和繁荣,最终催生了成熟的通俗小说,直接奠定了后来白话小说的叙事模式,小说的结构类型,白话的语言,以及以市民大众作为受众的读者群。话本小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城市文化的热闹景象。

明代的中后期,商品经济得到迅速发展,可谓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建立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基础上的经济形式,促进了城市的发展,城市文化也因之得以进步。这些可以从冯梦龙《三言》和凌濛初《二拍》之类的短篇小说中读出。小说中一反传统的识见,认为“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举反在次着”^①,商业活动为人们所看重。商人为了自己的事业,不惜抛妻别子,像杨八老一样,其敬业精神叫人钦佩^②;商人的地位也明显提高,所谓“一品官,二品客”^③;商业活动的艰辛也赢得了人们对商人性生活的适度宽容,如《钱名处白丁横带》等篇。小说常把“情”和“欲”放在“理”或“礼”之上,要求“礼顺人情”,这意味着道德规则只有建立在满足人们的正常情感需要的基础上,才有其合理性,所谓“相悦为婚,礼以义起”^④。此时,人们对金钱已经突破了“小人喻于利”的观念,肯定了金钱价值,就如在徽州,“凡是商人归家,外而宗族朋友,内而妻妾家属,只看你所得归来的利息多少为重轻。得利多的,尽皆爱敬趋奉,得利少的,尽皆

① 《二刻拍案惊奇·叠居奇程客得助》,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6 年版。

② 《喻世明言·杨八老越国奇逢》,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③ 《喻世明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④ 《醒世恒言·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2 年版。

轻薄鄙笑。犹如读书求名的中与不中归来的光景一般^①。这些都反映了在新的城市经济中,人们对新的城市文化的营构。

清末民初的上海,开埠后以商贸活动而迅速崛起,并受租界的催化,商品经济繁荣起来。建立在此经济之上的上海都市文化丰富多彩,呈现出多元化的倾向。既有高雅的成分,也有通俗的因子;既有西方文化开放的一面,也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要素。这些可以从小说的写作中得到验证。当时较有影响的鸳鸯蝴蝶派小说,骈体的形式,诗词的应答,显现了作品形式、情调的雅致;倾向于游戏、消闲的小说观念,对读者低级趣味的迎合,又有着向俗的一面。对待恋爱、婚姻,小说既有着在西方先进思想的影响下,主人公大胆而又热烈地追求;也有着受传统思想的束缚,主人公“发乎情,止乎礼”。至于小说中对物质层面、非物质层面的(包括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具体反映,后文中有详细叙述。

第三节 杂志与都市文化研究的现状、方法和意义

本文所言《小说月报》,除特别说明,皆指1910年7月(农历)创刊到1920年12月间的杂志。清末民初的上海都市文化,也大体以此为上下限,有时略有浮动。如此起讫,主要是与茅盾主编并成为新文学园地的《小说月报》相区别,而且此时段也是古代小说向现代小说蜕变的节点。

一、研究的现状和方法的演变

(一) 研究的现状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清末民初的文化、文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许多大胆且有见地的观点纷纷被提出来,一时间成果颇丰,于是这一阶段的文化、文学备受关注。然而直接从《小说月报》杂志着手,描述近代上海都市的小说与文化及其关系的论题,尚未有人

^① 《二刻拍案惊奇·叠居奇程客得助》,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涉猎,与此相关的研究倒是有一些。

主要的论文有:孟悦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构成》,李欧梵的《“批评空间”的开创——从〈申报·自由谈〉谈起》,陈大康的《关于近代小说研究的一些思考》(《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潘建国的《由〈申报〉所刊三则小说征文启示看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等,从一隅具体文化现象或者具体的数据入手,论及上海的传媒、小说和文化的发展状况,并得出规律性认识。

论著有: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和《20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两部专著对晚清小说研究格局产生很大影响。前者接受了当代叙述学的有关理论,从叙述时间、叙事视角、叙述结构三方面剖析作品,同时,作者力图沟通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研究,把纯形式的叙述学研究与注重文化背景的小说社会学研究结合起来,在运用新方法阐释清末民初小说文本的方面做了积极的努力。后者明确指出:“这无疑是一个以刊物为中心的文学时代。”该著作主要涉及1897至1916年的“新小说”,并积极运用小说期刊的史料,破除那种“全面”、“稳妥”的教科书心态以及把小说史作“史事编年”和“资料长编”的作法,本着以专家学者为拟想读者的目的修史,变平面的罗列为纵深的理论开掘,显示了研究者对这一段文学历史的独特理解和把握,并以敏锐的艺术感觉从多重理论视角描绘出清末民初小说的发展历程。特别是把市场的观念引入到研究清末民初杂志的编辑、小说的写作以及它们的传播和接受中,显得十分妥帖。李欧梵的《上海摩登》通过一份报纸、杂志,细化其中的一些司空见惯的对象,如对月份牌、阳历,声光化电等的分析,再现了文化的演变和受到外来冲击的反应,同时也拓展了新的文化、文学的批评空间。王德威的《想像中国的方法》通过细化的作品分析,如小说情节结构安排,叙事人称的变化等,提供了在西方小说影响下清末民初小说历史演进的丰富性。黄霖先生的《近代文学批评史》,著作中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梳理了晚清小说的发展规律,直接导引了对近代小说发展演变的宏观把握,同时,对当时的主要小说期刊也给予了

充分重视。陈伯海、袁进合著的《上海近代文学史》，从上海地域特色出发，结合其曾经是报纸、杂志的繁荣之地，从都市文化的角度揭示近代小说的发展和繁荣。

开埠后的上海，商品经济迅猛发展，一跃成为国际性的大都市，张仲礼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一书，从上海城市文化外延的诸多方面，勾勒出近代上海文化的状况，突出了市场在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主导力量。乐正的《上海人心态史》揭示了晚清上海人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心态发生的变化。

（二）方法演变的思考

第一，资料收集阶段。近代小说期刊研究开始较晚，且一般人不大重视，因此，像阿英的《晚清文艺报刊述略》，多是资料汇编的性质，对当时文学期刊的发展以及小说的走向缺乏综合、系统的规律性总结。至于工具书和史料汇编，也多是资料的整理和收集。当然，这种工作的本身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像樽本照雄主编的小说书目《清末民初小说年表》（1999年版），为翻译小说和创作小说的比较研究提供了可信的证据，同时也为此时小说发展状况的宏观把握提供了数据。20世纪80年代以来，除了工具书之类的研究外，还有个别突出的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如晚清四大谴责小说及其作者的研究。通过对近代小说界突出点的研究，希望能够形成对小说面的认识，和对当时小说发展的规律性把握。然而，由于近代小说代表性的点太少，因此难有大的作为。

第二，细化和量化阶段。由于近代小说本身传播方式的特殊性——报刊连载，小说的研究开始进入期刊的内部，通过细化，也就是通过某一局部放大研究，凸现当时小说发展特点。譬如，潘建国的《由〈申报〉所刊三则小说征文启示看晚清小说观念的演进》（《明清小说研究》2001年第1期），从广告的角度切入，把近代上海都市文化，渗透进小说期刊生产、流通中，如市场化的认识视角，真实地再现了小说发生、发展的原生状态。域外汉学家李欧梵的《上海摩登》，孟悦的《商务印书馆创办人与上海近代印刷文化的社会结构》等，从一份期刊及其相关文化入手，再现了小说产生的文化背景和